

谈资产减值的确认动机

龙成长

(宜春学院 江西宜春 336000)

【摘要】 资产减值会计准则的出台表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惯例的趋同。国际市场逐渐重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决策有用观成为有关会计目标的主流观点。本文通过对资产减值确认的理论动机与执行动机进行分析,指出两者存在背离的情况。

【关键词】 资产减值 动机 盈余管理

美国管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西蒙认为,动机指的是一个人之所以遵循某一特定行动路线的原因。而经济学意义上的“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理性人”的行为动机就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企业是由一群有自身利益的个人或组织组成的,包括股东、债权人、政府和管理当局等,他们都为企业提供某种投资,并期望能从投入中得到经济和非经济的利益,这种自利性的要求使得每个个体都存在转移财富的行为或动机,谋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

一、资产减值问题提出的理论动机

资产减值是生产经营中客观存在的现象,而资产减值产生的原因有社会原因和企业内部原因。社会原因主要是指: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相同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使资产的重置成本降低;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和应用,使原有资产面临被淘汰的风险;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如汇率下降造成进口设备、原材料出现贬值;债务人的破产或其他原因等而使债务无法清偿。企业内部原因主要有:因使用或操作不当而造成资产的提前报废;企业的经营业绩已经或将要无法达到预期水平;因环保等问题而导致资产被限期停用。上述原因都会导致资产的可收回价值低于账面价值。为了公允地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状况,有必要确认资产减值,调减资产的账面价值,这就是资产减值会计出现的动因。

通过对资产减值成因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资产减值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它又具有不确定性。对此,会计学者达成共识,资产减值的确认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但这可能会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权衡可靠性和相关性的基础上,资产减值的公允确认被认为更符合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就是资产减值问题被提出来的理论动机。

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执行动机

1. 管理当局的分红动机。根据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由于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企业管理当局事实上对资产拥有较大的经营管理权。但这些资产毕竟是由各利益相关方投入的,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必然会与管理当局订立合约来激励和约束管理当局的行为,其中分红计划就是最

重要的合约之一。根据委托代理理论,资产所有者(股东)与资产经营者(管理当局)处于委托代理链的两端,由于两者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客观上的信息不对称,只要不存在一种能够充分反映企业及管理当局行为的指标,管理当局就有可能利用其信息优势,侵害股东的权益,这就产生了代理成本。为了降低代理成本,就要使管理当局与股东的利益目标趋于一致,这通常要通过他们之间签订的管理契约来实现,而一个有效的管理契约应当为管理当局提供恰到好处好处的激励,促使其行为选择能使企业价值最大化。

如何对管理当局履行合约的情况进行考核呢?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的存在,能反映管理当局主观努力程度的信息我们无法获得,只能用外在的客观信息作为替代来进行评价。这时候会计信息成为企业订立和执行契约的依据就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因为会计信息可以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管理当局的努力程度。另外,会计信息获取要相对容易一些,可以通过会计信息中的相关指标来考核评价管理当局的工作业绩,这样会计信息就成为计量和监督管理局履行合约的重要工具。在会计信息中,收益指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它能反映企业的获利能力。

虽然股东与管理当局订有契约,但是管理当局是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会计信息的产生也受管理当局的控制,管理当局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必然有为满足其自身的经济和非经济利益要求而操纵会计信息的信息经济动机。为此,Watts和Zimmerman(1986)根据股东与管理当局的契约,提出分红计划假设:在其他经济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实施分红计划的公司更可能采用将未来收益提前到本期确认的会计政策。

Healy(1985)对分红计划的细节进行了检验:①如果盈利低于支付红利的最低目标盈利水平,则经理人员便有进行“巨额冲销”的动机,即通过提前确认费用或递延确认收入,以进一步降低当期收益,从而提高未来期间的盈利;②若实际盈利高于目标盈利的上限,则经理人员存在通过递延盈利来降低报告收益的动机,因为超过上限的盈利将使他们永远失去获得这部分红利的机会;③当企业盈利界于分红计划的上下限

之间时,经理人员才能如分红计划假设所言,篡改盈利额来提高分红的现值。同时,如果经理人员的分红计划中包括了认股权,则他们更愿意选择平滑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股票价格的稳定增长。总之,不论怎样,经理人员总是试图操纵能够纳入分红计划的收益来提高自身的报酬。

2. 管理当局的融资动机。企业的融资分为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当企业采用债权融资时,资金或者来自银行,或者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这就在管理当局和债权人之间形成了债务契约关系,而管理当局往往拥有它所管理公司的股份,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管理人员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而与债权人在利益上是相异的。这种相异促使管理者采取一些行动将公司价值从债权人转移给管理者和其他股东。同时,在“有限责任”的法律规定下,企业用所获得的资金进行投资,投资成功后,股东可以获取大部分的剩余,而债权人拿到的只是利息收入;若投资失败,由于“有限责任”,股东在破产时可能难以偿付全部的债务,则债权人就要承担一定的损失。

因此,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往往采用两种手段:一是提高利率,以高额的回报来补偿增加的风险,但由于目前国家对银行贷款及债券的利率通常会加以限制,因此这种方式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二是债权人要求在债务契约中规定一些限制性的条款来降低风险,比如规定最高负债比率、限制对资产的清理和转移、规定利息保障倍数、限制企业发行新债等。如果债务人不能履行协议规定的条款,则视为违约。这些限制性条款一般是根据会计信息来订立的,对条款的监督,也是以会计信息为基础的,而违反契约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管理人员有强烈的动机进行会计选择,以减少技术上不能履行契约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当存在债务契约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的会计政策。此外,如果在某种政策下会发生违约行为,人们将预期经理层变更会计政策,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这就是债务契约假设。

对债务契约假设,西方许多学者也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符合债务契约假设。我国王跃堂(2000)以1999年745家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四大减值准备选择为研究对象,从契约理论的角度出发,以资产负债率作为研究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并未发现债务契约假设在国内成立。而于海燕、李增泉(2001)以1999年385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会计选择与盈余管理的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影响企业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主要因素包括资产负债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债务契约假设在国内得到证实。上市公司从2007年开始执行修订后的会计准则,债务契约假设需要进一步验证。显然,管理当局有选择有利于管理者和股东的会计政策的动机。

当企业选择股权融资时,西方企业上市门槛较低,如美国规定,符合要求的企业只需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注册存档,即可在两年内持续发行股票而无需SEC的批准。2001年以前我国证券发行市场实行的是额度制,在额度制下

仅有少数企业可以获准发行股票,并且企业过去的经营业绩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2001年后改为核准制,但本质上仍属于实质性审批制度。该制度规定发行股票的企业必须符合一些必要条件,如企业必须在近三年连续盈利。这就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诱因。尤其是经营业绩不佳的公司,为了获得上市资格,更需要通过盈余管理来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另外,一旦获准发行股票,公司过去的经营业绩又会直接决定或间接影响股票的发行价格与股票能否顺利发行,盈余管理显得更为重要。财务包装作为公司在首次公开募股(IPO)之前的一个重要环节,公司完全有机会在财务包装的过程中进行盈余管理。公司的股票发行和上市采取的是“直通车”方式,改制后公司真实的经营业绩无法显示出来,使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有一定的隐蔽性。卢文彬对1996年和1997年所有的IPO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些IPO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都出现明显的下降,并进而证实了IPO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是由于过度财务包装所引起的。

上市公司取得上市资格后,最大的受益是能从证券市场上直接融资。能否获得配股资格对一个上市公司而言极为重要,这将影响上市公司后续资金的注入,盈利投资项目的规模扩展。但是,并非所有的上市公司都能获得配股资格。我国证监会自1993年开始制定配股政策,尽管制订的配股政策有一个演变过程,但始终包含着会计盈余指标的要求。如1999年之前配股政策要求的是连续三年的净资产收益率每年都须在10%以上(个别基础性行业为9%),因此如果其中某一年不能达到10%,则上市公司前一至两年的“艰苦”劳动将付诸东流,必须从下一年度起重新奋斗三年,故上市公司借助盈余管理来实现配股的目的。持这种动机的上市公司比较普遍。蒋义宏和魏刚的研究表明:在我国证监会1996年1月2日发布17号文之前,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ROE)呈正态分布,从高点向两侧应是较为对称的平滑曲线。孙铮、王跃堂的研究发现ROE呈非正态分布,如1997年有27%的沪深上市公司的ROE在10%~11%之间,毋庸置疑,有的上市公司的ROE就是通过盈余管理行为达到的。1999年后配股政策改为“净资产收益率最近三年平均10%以上,但任何一年不得低于6%”,虽然遏制了“10%的现象”,但“6%现象”却在重演。

3. 管理当局的减少政治成本动机。与政府的契约也是企业契约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会计数据常被用以支持政府现有的法令或成为实施新法规的理由,企业为降低与政府的契约的成本,就产生了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调节会计收益的动机。

政治成本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税收成本。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企业的各项税收,对政府来讲总是希望能多征税,这最终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减少其现金流量,企业的管理当局总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降低现实的和潜在的税负,其中就包含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或者对可能出台的准则进行游说。②收费政策。政府对某些受管制企业(如公共事业部门、银行、石油、保险公司等)的产品

盈余管理的悖论

柳艳丽 朱文莉

(陕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西安 710021)

【摘要】 盈余是公司各利益相关者关注的焦点,也是各方矛盾的焦点,只有通过巧妙平衡由盈余管理悖论产生的各种相互矛盾的需求,管理者才能获得好的业绩。

【关键词】 悖论 盈余管理 利益相关者

企业存在就是为了获得利润,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利润和利益就会存在盈余管理的问题。所谓问题,其实它就是矛盾。所以笔者认为盈余管理既是一个问题,又是一个矛盾,也就是悖论点。

一、盈余管理概念上的悖论

1. 经济收益观下的盈余管理概念。经济收益观认为,经济收益之所以被扭曲而成为会计报告收益,存在两个影响因素:其一为应计制会计和公认会计原则,其二就是盈余管理。美国学者 Scott 是最早给盈余管理下定义的,Scott 在其著作《财务会计理论》中指出:盈余管理是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的一种具体体现。只要企业管理者有选择不同会计政策

价格和收费标准是根据公司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来确定的,因此受管制企业通常希望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能对管制施加影响,以有利于本企业或行业。^③不对称损失函数。即政府和投资大众由于信息成本而导致对损失或失败的敏感程度的差异。为避免因大公司的失败或破产引起潜在的政治危机,政府机构宁愿消除高估资产的潜在根源(如资产的重估升值),也不愿消除低估资产的可能。

政治成本假设指出,大规模企业的政治敏感性和所承担的财富转移额(政治成本)均大于小规模企业。为避免引起政府部门的过分关注,规模较大的企业总是倾向于均衡收益,尤其是避免出现高额的利润,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选择那些能够将当期收益递延到下期的会计处理方法。对于政治成本假设,西方学者及我国学者都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加以验证,结论基本一致,政治成本假设得到了证实。

三、理论动机与执行动机的背离

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发现,资产减值问题提出的理论动机与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执行动机是相背离的。其原因主要有:①契约的不完备性使管理当局有机可乘。理论上研究资产减值问题考虑的是资产减值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影响,而实际上资产减值的确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管理当局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留出了空间。②信息的不对称性为管理

的自由,他们必定会选择使其效用最大化或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会计政策。其从经济收益观的角度,强调企业管理者对会计盈余或利润的控制。在此观点下,盈余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得到令管理者满意的财务会计结果,会计盈余是决定财务成果满意与否的重要参数。

2. 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概念。信息观认为,盈利是许多决策和判断的重要信号,会计数据的重要属性便在于其具有信息含量这一统计特性。美国著名会计学者 Schipper 因此认为以信息观来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她将盈余管理视为一种“披露管理”,认为盈余管理是管理者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对外部财务报告过程进行的有目的的干预和歪曲控制。

当局利用资产减值操纵利润提供了可能。管理当局是会计信息产生的控制者,其他利益相关者由于对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管理当局为了某种目的也就可以在资产减值的确认与不确认之间进行选择。^③交易中的自利行为原则是管理当局进行资产减值会计政策选择的动机。根据自利行为原则,行为者在进行决策时将按照自己的财务利益行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会选择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管理当局当然也有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因此,在资产减值问题上就有分红动机、融资动机和降低政治成本动机等。

主要参考文献

1. 任进军,禹冰.有关资产减值会计理论的探讨.财会月刊(会计),2006;2
2. 张奇鹏.浅谈资产减值会计的确认与计量.商业会计,2006;2
3. 李建民,张华伦.初探资产减值.财会月刊,2001;2
4. 王中信,杨德明.契约视角下会计政策的选择.审计研究,2006;1
5. 崔晓钟,韩海文.资产减值会计计量中可回收金额的思考.会计之友,2006;5
6. 曾慧兮.刍议我国资产减值准则对国际会计准则的借鉴.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6;6